

- [35] 鲁西奇, 中国历史的南方脉络 [C] // 鲁西奇, 人群·聚落·地域社会: 中古南方史地初探.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1; 鲁西奇, 层累、汇聚地造成的地域古史系统——以先秦越国的历史叙述为中心 [J]. 历史人类学学刊, 2013, (2).
- [37] 严庆、刘赫, 赞米亚: 术语、意涵及启示——基于政治人类学的视角 [J]. 西北民族研究, 2019, (03).
- [38] Erik Mueggler. *The Age of Wild Ghosts: Memory, Violence, and Place in Southwe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Jianxiong Ma. *The Lahu Minority in Southwest China: A Response to Ethnic Marginalization on the Fronti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 [39] 张先清、杜树海, 移民、传说与族群记忆——民族史视野中的南方族群叙事文化 [J].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4).
- [40] 朱晴晴, 移民、市场与社会——清代以来小江地域文化的演变 [D]. 广州: 中山大学, 2011, 82-83.
- [41] [42] 佚名, 勐泐王族世系 (汉文、傣文对照) [M], 刀国栋等译,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7. 江应梁序. 3.

【学术访谈】

移动的宋辽边疆 ——英国伯明翰大学史怀梅教授学术访谈¹

董永强²

一、前言

史怀梅 (Naomi Standen), 1994 年英国杜伦大学 (University of Durham) 东亚研究系博士毕业, 学位论文题目为《从中原北部到辽的越境举动: 约 900-1005》(*Frontier Crossing from North China to Liao, c. 900-1005*), 此后, 历任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 (St. John's College, Oxford) 中国史初级研究员 (1993-1997)、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苏必略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Superior) 历史系亚洲史副教授 (1998-2000)、澳洲新堡大学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历史学院中国史讲师 (2000-2007)、英国新堡大学 (Newcastle University) 历史学院中国史高级讲师 (2007-2011), 现为英国伯明翰大学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艺术与法律学院 (College of Arts and Law) 历史与文化系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 中古史教授 (2011-)。目前, 她致力于欧亚北部边疆问题的研究, 主要关注中古时期东北亚越境者、边界、边疆之间的互动关系。执笔《剑桥中国史五代宋史》(五代) 部分, 2007 年出版专著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 (此书 2007 年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学界有很大反响。相关评介可参见 Richard L. Davis, "Book Review: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47(2007): 527-528; Paul Jakov Smith, "Review: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8.1(2008): 242-250; 张帆, 《书评: Naomi Standen,

¹ 本文刊于《汉学研究通讯》第 38 卷第 4 期; 转载自“宋史研究信息”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CUDtJd20Sg4VhwxCRWGeg> (2020-2-27)。

²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访问学者。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汉学研究通讯》27.3(2008.8):57-58;李怡文,〈书评:Naomi Standen,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历史人类学学刊》8.2(2010.10):152-155;吴国圣,〈不羁之忠——评介 Naomi Standen,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新史学》22.3(2011.9):209-244)。2015年该书被译成中文版《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她曾发表论文“五代时期的劫掠与边疆社会”、“游牧者的需求:劫掠、入侵与947年辽的征服行动”等数十篇,在学术界影响巨大。

2016年2月3日,在伯明翰大学历史与文化系史怀梅教授办公室,笔者就宋辽边疆地区的越境现象、身分认同、族群概念、英国的汉学与史学以及她个人对中外史学家治学方法的想法等问题,对她进行了学术专访。现将访谈内容整理如下并附其论著目录于后,以飨读者。

二、访谈内容

董永强(以下简称董):首先,祝贺您的著作汉译本出版¹。这本书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它主要是以汉人为主的辽南人(Liao Southerner)和跨界者为研究对象,探讨政治、军事变化对边界地区官员和将领忠诚意识、族群认同的影响。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我想知道,您是如何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找到值得研究的问题的?

史怀梅(以下简称史):开始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我对宋辽关系十分感兴趣。我不断发现许多文献中记载着类似的人群,正如我之前研究早期欧洲中世纪史时所关注的人群一样,他们曾做着同样的事情。攻读大学时,我研究的是西法兰克王国(West Francia,即今法国)和安达卢西亚(Al-Andaluz,即今西班牙北部)的关系²。他们以学识渊博闻名于该地区,我读本科时曾研究过这个家族。有趣的是,巴努·奎西是穆斯林,西法兰克是基督教徒,但是很显然,宗教、族群联系和语言与他们的立场变化没有关系。因此,他们有时乐意效忠于基督徒王国——法兰西国王,有时他们乐意效忠于穆斯林王国——安达卢斯国王。他们并不在乎改变立场。

我注意到宋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汉族官员中,有人事宋,但并非宋人。当我观察五代时,这个现象就变得很清楚。那些起初效忠于梁唐晋汉周之一的人们,此后效忠于辽。他们也不在乎改变立场。欧洲与中国情况相同,非常相似。所以,我对这些生活在边境地区、边境地带的边疆人群非常感兴趣。我开始寻找可以研究的人群,即那些跨界者,那些尽可能多地可以从两边都能研究的人群。因此,我想获得有关同一个人的历史信息,这些信息既有来自五代或宋朝这边的,也有来自辽这边的。当然,这很难,因为这段时期的文献互相承袭,史源错综复杂。³但是我发挥自身优势,设计了一种文本比较方法,利用文献之间的对比关系,试图看到10世纪发生的事情。起初是很难看出的,但我试图解开同一段历史的后续版本,看看在记载中剩下什么,看看10世纪的历史有可能告诉我们什么。但是做起来并不容易,很明显,在做这件事上有困难,甚至还有问题。

董:在10世纪欧洲和中国北部的现象之间,您发现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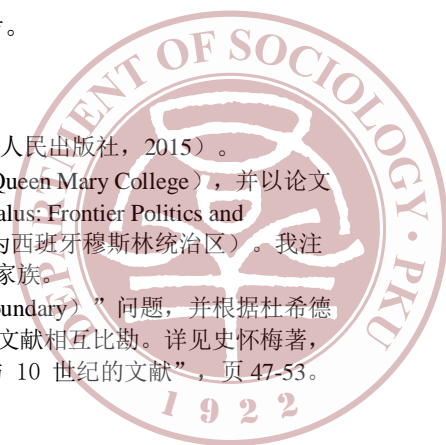
史:它们看起来是相似的,虽然并不完全相似,但足以引发思考。

董: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您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国中古史?

¹ (英)史怀梅著,曹流译,《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² (1984-1987年,史怀梅就读于伦敦大学玛丽王后学院(University of London, Queen Mary College),并以论文〈秃头查理与安达卢斯:边疆政治与外交关系〉(Charles the Bald and Al-Andalus: Frontier Politics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获得历史学一等学士学位。安达卢西亚(Al-Andaluz)为西班牙穆斯林统治区)。我注意到在那个区域里有些时常改变立场的家族,特别是巴努·奎西(Banu Qasi)家族。

³ 为破解这些难题,史怀梅首先探讨了“史书编纂中的边界(historiographical boundary)”问题,并根据杜希德(Denis Twitchett)的讨论,厘清了《辽史》的史源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文献相互比勘。详见史怀梅著,曹流译,《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第一章“史书编纂中的边界与10世纪的文献”,页47-53。



史：我的学士学位是研究中世纪早期欧洲历史。在攻读本科学位第一年，一个朋友借给我一本节选的英文版《庄子》，即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¹ 翻译的《庄子》。读过此书后，我发现它和我以前读过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我喜欢与众不同的东西，觉得差异真的很有趣。因此我想更多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想知道为什么那里的人们可以产生我以前从未遇到过的这些惊人的想法。所以，我设法将研究范围稍微向东方推进了一点，并决定攻读中国中古史（Chinese Medieval History）的博士学位。在中世纪欧洲历史方面，我完成了我的第一个学位，然后我去了台湾学习汉语，所以我可以攻读中国历史的博士学位。中国历史是与众不同的，正是因为它的独特性，引起了我的想象。

董：《庄子》的想象神奇、玄妙、超绝，而且充满了智慧。因此，很难读懂。就断代史而言，您认为您的英国同行和中国历史学家的研究有哪些比较重要的差别？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您认为会是什么？

史：很少有英国学者研究中华帝国史（Imperial Chinese History），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是少数，也许 5 到 10 位，他们大多关注宋、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史，主要是地方史、区域史，特别是东南部地区，因为存在大量的我们才刚刚开始研究的初级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由文人士大夫们制作的。而且，我认为这些学者中的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多地使用历史学方法。因此，在英国，为那些研究中国的人提供的传统培训就是学汉学、学中文。从事汉学的技能非常重要，但它们不同于历史技能。我认为越来越多在英国从事研究的学者开始使用更多的历史方法来研究帝国历史。而不仅仅是汉学技能。这给了你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因为当今的历史研究要求人们对某些理论、历史理论和其他类型的理论有一些了解，并采取一整套不同的方法来做，而不仅仅是关于文本解读。

现在有很多人在英国和美国学习中国历史，越来越多的人想和其他大学历史系的历史学家交流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英国的历史系过去主要研究英国和欧洲的历史，确实不涉及其他。但现在大多数历史系都有一位中国历史学家，有时更多。他们几乎都是现代主义者，不关注中华帝国，而是自晚清进入到现代时期。因此，尤其要告诉这些人 and 他们的同事，中国历史是多么重要，而且历史系确实需要研究中国历史。不只是在中国研究领域，中国历史正逐渐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但这对于中华帝国史来说并不真实。因为它研究的是前现代时期，在一些地方它仍然是在中国学系（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但确实有一些人，像我一样在历史系。他们也想告诉那些研究英国、欧洲、美国、非洲等等历史的同事，中国史也是重要的，他们需要在历史系中有人研究中国历史。

董：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大学里同样存在，历史系的学者更多关注的是中国历史，而不是俄国历史或者美国历史。

史：我读大学时，英国大学历史系的研究只关注英国和欧洲，也有点关注美国。但自从我工作后，研究范围有所扩展。现在大多数院系都在努力变得更加全球化，尽量更多地涵盖世界各地，但这个过程相当缓慢。

董：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反思传统史学中的汉化模式和汉族中心观的局限性，逐步纠正对征服王朝和异族文化的偏见，并用新的视角来客观讨论突厥、契丹、蒙古等族群的历史和文化地位。作为一名一直关注欧亚草原民族和族群文化的专家，您认为以往的中西方关于边疆族群的研究有什么理论缺陷？西方的民族认同理论在多大程度上适宜于中国相关问题的研究？

¹（美）伯顿·沃森（Burton Watson, 1925-2017），中文名为华兹生，是美国著名的翻译家，主要致力于中日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对中国哲学和史学著作也有涉及。他翻译的《庄子》被收入大中华文库出版，同时也入选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Masterpieces*（《诺顿世界名著选集》，1997），成为中国典籍在美国译介的经典之作。

史：这真是个好问题。我认为我们在研究中国及其他地方的边疆问题时，主要是种族的起点问题。如果你从种族观念出发，你就必须探讨族性（ethnicity）。¹

因此，有一种假设，即民族认同必须始终是前现代时期人们的主要身分。可能对现代人而言，民族认同是他们的的主要身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前现代人也同样。我们就不能不去探讨“种族对他们来说是否最重要”这个问题。我认为问这个问题很重要，也许答案是“种族对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设定了答案，如果我们说我们已经知道答案是什么，那么我们就无法思考其他各种各样的可能。例如，我们不能思考其他类型的身分对他们来说是否更重要。也许他们的社会身分更重要。也许他们是学者官员，或者是农民，或者是工匠，这些身分更重要。或许他们的政治身分更重要。也许他们的主人，他们的统治者，是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对他们来说更重要。这些都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能够询问他们。因为我们不能妄想知道答案是什么。

因此，我认为中国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当我们认定种族是最重要的，把可能一切都被归类为“汉人”或“非汉人”。这意味着，除了我刚才描述的问题之外，它还假定你可以很容易地分辨出谁或者什么是“汉人”，谁或者什么是“非汉人群”。而且在这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

另一个问题是把所有的“非汉人群”属于一类，所有的“汉人”属于另一类。所有的非汉人群被混在一起，但它们彼此不同。汉人一直都是汉人，非常特别。如果认为中国性重要，而非中国性不重要；如果将人群分为“汉人”和“非汉人”两大范畴（categories），那么就必须思考如何定义他们？汉人是因为他们是汉人后裔，还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或者因为他们所采用的文化而是汉人？譬如，如果你用中文名字，并声称要像一个汉人一样行事，你就会变成汉人吗？

问题是，这两个范畴都被使用了。有些学者会用其一。当祖先们的定义适用于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时，他们就会使用该定义；或者当使用中文方式的定义适用于他们所想要表达的东西时，他们就会使用中文名称的定义。因此，根据你所说的，你可以使用这两个词，也可以使用任何一个定义。所以，如果你想声称 10 世纪的中国边疆人群不为非中国统治者工作，那就没有中国人会为一个非中国统治者效忠。如果你想宣称这一点，那么你就定义了“边疆人”，你在强调边疆是一个混合民族的地区，因此，边疆的人不是中国人。所以没有中国人会为非中国人效命，因为那些人不是中国人，这是非常方便的，如果这就是你想说的话。

如果你想宣称非中国统治者变得中国化，那么你强调的是他们用汉名，用汉人政府结构等等，突然，他们成为中国人。当然，唐朝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起源于混合种族，这是非常清楚的。但历史学家真正喜欢说：“但他们是中国人”，所以这是非常矛盾的。人们对此非常担心。我想人们很担心：“这些人是中国人，那些人又不是中国人？”而不是说：“我们不用担心。先让我们看看他们做了什么。让我们试着去研究到底是什么真正激励了他们。也许是他们的民族身分，但也许不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不要坚持认为，他们行为的动机一定是他们的种族认同。

董：当我们读唐代的一些历史文本时，我们可以看到，在唐代，一些非中国人在西部地区可以改变他们的身分。您认为西方的身分理论是否适用于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改变身分的分析？

史：是的，我认为当我们看到你刚才描述的案例时，必须非常小心。我们怎么知道你所探讨的人自己想被认为是“汉人”？也许他们是这样。但是，我们需要谨慎使用我们的范畴。西方有许多不同的相关理论，但也许最有用的，是人们有多重身分。所以，他们可能有国家认同身分、地区性的身分、阶级身分、职业身分、性别身分等等许多不同的身分。他们可能在任何情况下使用一个或多个身分。因此，他们将根据他们所处的环境选择某些身分。譬如说，我是英国人，英格兰人，来自伦敦。我要说的是，我的身份取决于我在和谁说话，如果我跟美国人说话，我可能会说我是英国人。如果我和苏格兰人谈论苏格兰独立，我可能会说我是英格兰人。如果有人问我

¹ 史怀梅认为，不管前现代是否存在“族性”观念，人们都一致认为“族性”观念在前代至少部分上已经有所规范，并且假定它决定人们行为时起了重要作用，决定了包括从文化标准到政治效忠领域内人民的行为。

从英国哪里来的话，我可能会说我是伦敦人。所以我使用的每个身分，都取决于我所处的环境。我也可以使用我的阶级身分，或者我的性别身分，这取决于情况和与形势相关的东西。因此，当你在思考情况时，要关注多重身分的概念，每个人都有许多个身分，他们会选择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是最直接有用的某个身份。例如，可能是你唐人，属于非汉人群，取汉名，学写汉字。但他们也可以继续沿用自己的、原始的、仪式的习俗。他们可能有他们喜欢吃的食物。所以，这取决于他们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他们在做什么。如果他们和一个中国皇帝交谈，他们可能想要强调他们能读和写中文。如果他们在和亲戚谈话，他们可能会说让我们开个派对，吃传统饮食。

董：近代民族国家成立之前的辽人、宋人、金人等这些族群，跟民族有什么不同，我们在做历史时期的边疆民族研究的时候，nation, ethnic, people 这些概念到底该怎样使用，您认为用哪个更加合理？

史：另一个重要的理论，是身分被建构的想法。它们通常是出于政治原因而被制造出来的，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的。所以，不能认定生于河南的人就是中国人。出生地这个要素很重要，但它不一定会对那个人的一生都重要。所以我想，辽和金继续唐的实践，更重视的是人们所能做出的贡献，而不是他们的种族或文化背景。例如，唐朝重用高句丽人为将领，辽则用宋人为将领等等。在这一点上，宋似乎是不同的，可能也是 1005 年澶渊之盟以后，北宋时期的文人精英愈加强调“夷夏之别”，越来越多地强调宋人和辽人之间的不同。因为他们是敌人，宋想要把辽“他者化”（othering）。¹

也许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但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但我认为，这是一些需要思考的重要想法，因为我一直在说，这些事情应该是问题而不是答案。我们不应该假设答案。如果我们考虑的是少数群体，使用“少数民族”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假定有多数。如果你谈论少数民族，那么你就假定汉人占多数，所以汉人总是处于中心地位，不可能以平等方式看待其他族群，无论他们是谁。如果你使用“族群”这个词，你可以将他们视为独立于汉人的族群来考虑，不必总是和汉人有关，可以考虑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你可以考虑突厥人与藏族人的关系，如果与汉人无涉的话，根本不需要考虑汉人的存在。所以，我认为避免使用“少数民族”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如果用这个词，就永远逃不出胡汉两分的分析模式。它假定大多数人口是中国人。当然，唐代人口极其混杂，会忽略使用“少数民族”，因为它假设有“汉人”，而“汉人”其实是多种族混合而成的。

董：读您的书，让我重新思考如何在我的研究中运用“民族”概念，因为在唐代，我们没有这个概念。用现代概念来分析前现代情况是否合理？

史：这非常困难。如你所言，“民族”是现代概念，很多研究试图在一个没有真正用过它的历史时期探讨它，如你的课题名称是“唐代西州基层社会与民族治理研究”。所以，如果你只是从基层社会的视角去思考治理问题，那么你会忽略族群问题，而没有尝试和谈论族群问题，只是关注治理和基层，而不用担心族群是什么。“族群”对你的研究有贡献吗？他们有什么贡献？这些是你要思考的核心问题。我倾向于用辽来指一个政治单位，它当然是多族群的，有汉人、契丹人、突厥人、沙陀人、回鹘人，是个多族群混合统一体。所以，我将政治单位与文化团体等其他团体严格区分开来。我更倾向于探讨文化单位，而不是族群，因为文化是你讨论的。

董：在正史上，突厥只是一个名词而已。因此，我们不知道它的真正含义。我们从古代历史记载中仅仅知道突厥与中原不同。我们对他们的感情和他们的文化了解甚少，关于他们的信息和

¹ “他者”是在现象学中同者相对的概念。他者的形成必须发生在二元对立的关系之中，而且对立的双方存在着某种不平等或压迫关系。同者利用武力、语言、意识形态对他者行使霸权，对其进行排挤、支配和控制。他者被边缘化、属下化，失去话语权的过程称为“他者化”。



材料非常有限。然而吐鲁番文书中记载，突厥游奕部落派人修护堤堰，引水灌溉农田。我怎么能用原始材料和新的视角来研究这么少的信息呢？¹

史：吐鲁番的突厥人修堤堰，浇农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种方法是说：**让我们把研究人群的所作所为放在首位，而将族群标签放在第二位**。也许我们可以构建一个场景：这里有一群人，被称作突厥人，他们修渠灌溉，他们养马，他们贸易，或者做其他事。虽然你能得到一个被称为突厥人做的所有事情的清单。但你无法假设你知道他们将要做什么。你必须从历史文献所记载的人们开始探讨，得从那里开始建构。因此，我们经常犯的毛病是，有突厥人这个范畴，并且认为文献告诉我们的某些事，是所有突厥人都会做的。但是，他们当然并不都那么做。你可以将它作为因素之一，与出土文献记载的人们实际正在做的事情进行比较。它们是否匹配？或者它们在哪里匹配，哪里不匹配？也许他们并不是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人们正在做的事情上有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做同样的事情，还是做不同的事情？而不是假设任何一个突厥人都会和其他突厥人一样做同样的事。因为我们也不认为汉人都做同样的事情。汉人中有些人是文人士大夫，有些是农民，有些是工匠，有些则是士兵。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假设每个突厥人都做同样的事情呢？我想说的是，**族群研究首先应该从文本中的实际内容开始，然后搁置但非忽视其标签，而是将其放在一边，放在第二位，专注于文本告诉我们的研究群体的行为：他们在做什么。**

董：这答案很棒，但不同文本之间有时会有出入。

史：这是历史文本的问题。编撰历史很困难，史家们不得不从某种视角出发修史，形成历史记载的文本。但是如果试图了解那些被书写者的所作所为与所思所想，我们唯一能依赖的就是史家们的记述，但这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依赖于史籍记载告诉我们被书写者的言论，因为很多时候史家编写历史以弥补历史人物的言论，是编撰者创造了这些话。所以这是不可靠的，但我们可以更自信地描述某个历史人物，比如，他给某人写了一封信。他杀了某人。他又投靠某人。他参加了修渠劳动。在小心求证的同时，对记载下来的他所做的具体事，我们可以稍微有点自信。

董：在我看过您的书之后，我很欣赏您用来分析种族和身分的框架，我想把这个框架应用到我的研究中。然而，由于时间和材料的限制，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为我的课题制定一个新的框架。您是如何建构分析框架的？

史：这非常困难，为它我花了很长时间。在读博士时，我逐渐设计出研究所需的分析框架。但是，当我为本书重新修订博士论文时，我把所有东西都颠倒过来。实际上，我要从另一个地方开始，因为在研究过程中，我改进了分析框架。我不知道是否存在一个提前创建的单一模式的分析框架。

我的出发点是：我们能弄清楚我研究的历史人物是怎么看待忠诚的，他们又是如何从忠诚中获益的。那是在阅读一些传记并将之与欧洲的案例比较后发现的一个问题。现在，我正在用一个新的框架来考虑它。忠诚源于对国家边界的担忧和不满，以及对利用国家政治实体作为前现代历史的主要基石的不满，而我们仍然经常这样做。

很明显，像佛教这样的事物不注重国家边界。那么，当佛教与国家边界无关的时候，你该如何处理佛教这样的话题呢？你可以斩钉截铁地说：“这是辽的佛教，这是高句丽的佛教，这是西藏的佛教。”但它们实际上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这并不是很有帮助。出于政治原因，研究者常常人为地把它们分成不同的单位。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如此重要？所以我正在尝试思考研究这些问题的新方式。因此，我认为，要想形成新的框架，就必然要抛开旧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真正批评。追问自己：“它们不起作用。那么有什么别的我可以用的吗？”“即使它带我去一个非常

¹ 两事见吐鲁番阿斯塔那 509 号墓所出《唐开元二十二年（734）西州高昌县申西州都督府牒为差人夫修堤堰事》和《唐开元二十二年（734）西州都督府致游奕首领骨逻拂斯关文为计会定人行水浇溉事》，文书内容见唐长孺《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 4 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页 315-317。

奇怪的地方，它可能会做什么。”要努力去尝试形成新的分析框架。每个项目都需要自己的框架，而且需要采用自己的方法。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敞开胸怀，变得非常非常挑剔。我有这样一个框架，让我思考种族问题。但是，如果它对这些人没什么用。那么，我能不能从其他不同的角度来考虑这些人呢？使用新的范畴，让它更有意义。所以我试图深入到我所读到的人的头脑中。我正在研究谁？好吧，他们是不是从种族角度来思考的？我能确定他们是怎么想的吗？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所以在我的书中，这让我想到，忠诚似乎是激励他们来到这里的原因。他们把忠诚放在哪里，似乎是驱使他们的原因。所以，我在寻找是什么驱使人们采取行动。那么，是什么让人们以某种方式行事呢？我能看看里面的图景吗？但实际上很多人都在使用同样的东西（也就是忠诚）。所以我愿意重新审视分析所使用的范畴，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你就不会认为你已经知道这些范畴是什么了。你说，“实际上，这类分析是行不通的。有什么我能用得更好的吗？”但是这并不容易。

董：在边疆民族地区，当您处理中央和地方政府时，很难只使用一个分析框架。

史：是的，所以，就你的研究来说，你要自问：种族概念是有用的吗？它起作用了吗？这是人们曾在使用的东西吗？需要把它当作一个问题来提出。不要想当然。同时，我也会想：政治在这里是如何运作的？这些人自认为是唐代行政区的一部分吗？或者他们认为自己是突厥的一部分？这与政府机构、行政单位有关？还是与忠诚有关？如果你在谈论粟特人，尤其是它真的与经济学有关吗？它真的是与贸易网络和人群关系相关吗？也可能根本不是。那什么是它们真正的意义？是契约吗？他们是否考虑与人签订契约？与死者签订合同？还有什么是可以谈论或思考的？与阶层有关吗？人与人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吗？我们是下层民众，我们就必须做文人告诉我们的，或者我们必须按照官员告诉我们的去做？还是我们必须做我们的首领告诉我们的？

所以，我会尽可能考虑使用更多不同范畴。你能看到，人们曾使用多少种不同的范畴，然后你可以开始说：哪个更行得通。在你的文本中，哪个范畴似乎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人们关心的事物中。不是在我们脑子里，而是在文本里。但是，我们必须从我们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后退一步，因为现实世界是由一切通向我们的事物所塑造的。

我试着想象过去的人们有不同的方式来构建这个世界。他们采用不同的方式来构建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并不总是有意义的。例如，宗教可能是重要的。对于西方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构建世界的方式。我们在学生中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我们试图让学生们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宗教对人们来说是一件生死攸关的事情。他们宁愿死也不愿放弃他们的宗教信仰。让学生了解这一点是一项重大成就，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觉得很难理解，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俗的国家。但这有助于他们认识到，也许还有其他范畴在过去是重要的，即使它们现在不重要。

董：现在学术界提倡跨学科研究，在您思考书写全球中世纪史（Global Middle Ages）时，您有没有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地理学或其他学科的最新理论和方法？如果有，您能举个例子吗？

史：**我认为西方历史学家是喜鹊，他们从任何来源获取主意（idea），只要它们行之有效。**在做全球中世纪课题时，我们借用了大量不同的想法。比如：我在研究中越来越多地使用物质文化。不是来自物质文化上的文字，而是城市规划和陶器，以及那种真正的考古学材料。最近我一直在思考，我发现从非洲考古学的研究中得出有关政治权力的理论是非常有趣的。因此，非洲考古学家提出了一些非常新颖的政治权力观，我认为这非常有用。他们帮助我思考我所关注的欧亚大陆东部的政治权力。他们对政治权力的本质、权威和合法性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见解，可资借鉴。

董：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往中国学者在研究中更多采用传统的方法，而不使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因为他们认为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界线。但现在也强调跨学科研究。

史：有很多西方历史学家喜欢以一种非常传统的方式进行研究。对很多学科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明智、而且优良的工作方式。但对于像“全球中世纪史”这样的新话题，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去研究。我们还在努力研究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这是一个新领域，还有很多其他领域。但这个领域，在思考关于事物的思维方式方面，其他学科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是有用的。

董：在中国未来的中古史研究领域，您最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成果呢？

史：目前在丝绸之路上做了很多工作，我认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因为它是一个新的领域，我们知道得很少。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考古工作也正在进行中，特别是在北方。我会特别感兴趣看到北方的考古进展。譬如安史之乱以后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考古成果。目前，在东南部的宋代大量的工作要做，因为这是所有材料的所在地，也是材料能所反映的地区。但事实上：北方发生了什么？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关于金、辽、蒙古的著作，因为中国学者对蒙古的研究不多。还有元代和元以后。人人都研究忽必烈，但没有人研究元朝后期，所以很少有人研究元代中期和后期，所有学术语言中都是如此。

董：相比其他朝代，可资利用的数据的多寡是非常关键的。

史：但元代有很多书面材料。元代是真正的谜，因为元代确实有文字数据。这并不难，但人们不学习它。

董：您认为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能称为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

史：我认为历史学家首先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质量、技能和习惯就是怀疑主义。不相信所读到的，批判并检验所面对的。这并不是说应该考虑它的真实性（authenticity）。我认为，真实性对历史学家来说并不是一个有用的概念，但他们应该阅读并怀疑：“这是真的吗？这真的发生了吗？”“写这个的人是谁？他们为什么要写这个？他们想说什么？他们想让我明白什么？”“如果我知道，那么这能帮助我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吗？”

报纸报导试图以同样的方式告诉你，他们编故事，试图告诉你一个特定的解释。但你必须剥离解释，并告诉自己说，事实上，在他们的解释背后有另一个故事，也许这才是我更感兴趣的。其次需要耐心和韧性。即使看起来不可能，你也要坚持下去。最后还需要有想象力。你必须能够试着把自己放在古人的立场上去思考。这样想：我是一个现代人，但我正在尝试想象生活在那个世界，一个历史上的世界，想象它是什么样的。

董：如今，许多研究历史的大学毕业生在中国找不到工作。他们将不得不攻读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能获得更高的学位，他们就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但在他们获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之后，他们仍然不一定可以找到好工作。所以有些人说学习历史是没有用的。您认为，历史对于普通人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

史：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历史本身：历史如何对人们有用？另一个是历史学学位对人们有用吗？我认为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回答。历史对人们来说很重要，因为它帮助他们了解我们的世界是从哪里来的。它有助于给人们一些感觉：其他人对事物的想法、做事的方式是与我们不同的。人们必须面对这种差异。

就历史学位而言，30年前在英国，由于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不喜欢历史，出现了一场大恐慌。她认为历史是无用的。所以历史学家们聚集在一起，列出了一份历史研究带给学生的技能清单，今天仍然在用。现在大学都有开放日（open day），为申请者攻读历史学位提供这方面的咨询服务。这就是为什么史学是好的：**史学使你能够处理大量的材料，了解它们，用大量不完备的材料来进行逻辑缜密的论证。史料总是不完整的。但你仍然必须能够从史料中得出结论，并根据不完备的材料进行论证。史学帮助你做到这一点。这在很多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你从来不知道所有的信息。你必须能够根据你所拥有的证据得出合理的结论。所以使用证据来构建一个特定论点的能力：这是史学赋予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事情。在这个**

国家，许多雇主看重历史学家所具备的技能，因为他们希望人们对事物能够批判和思考，能够用证据建构一个清晰连贯的论点，而不用担心他们信息不全。

董：常有人说：“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¹对某些人来说，研究历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弄清真相。但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不认为历史有任何真实性。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史：我认为在英国、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历史不是寻找真相。真相不止一个。历史可能有很多真实的解释，历史研究的重点不在于发现一个单一的真相；而在于就历史进行辩论、讨论和对话。并且要理解，许多不同的阐释方法可能都是有效的，因此一个历史事件可能存在几个不同的合理解释。有效与否，取决于你是谁，以及你想用它做什么，你选择了哪种解释。但它们都是有效的。并不是每一种解释都是正确的；有些人写了糟糕的历史，误用了证据等等，但有可能有几种不同的有效解释，它们确实以一种完全合理和明智的方式使用证据，但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这些结论可能都是完全合理的。只是你可能会从一个角度说，“我赞成这个解释”，我可能会说，“我支持那个解释”。这没什么。因为你们可以互相讨论，为什么你们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解释，这让我思考我的解释，然后我会说一些能让你们思考你们的解释的东西，所以我们都学习了。因为历史不是固定的。对历史的研究总是在变化，而且总是流动的。它是活着的，一种活着的东西。我告诉我的学生，当我们意见不一致时，我们学到的最多。有礼貌地，有证据的讨论历史，证据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解读证据有许多不同的可能方式，也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是正确的。因此，可以从人类学视角去解读，得出一个答案。也可以用历史地理学视角来解读，可能会得出另一个答案。以此类推。然后你把这些答案放在一起，会认识到整个事物的每个不同部分。

附录：史怀梅主要论著目录

(一) 专著

2009 “The Five Dynasties,”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5, The Sung Dynasty and Its Precursors, 907-1279, Part 1, ed. Denis Twitchett and Paul Jakov Sm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38-132.

2007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曹流译，《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二) 编著

2018a *The Global Middle Ages, Past and Present Annual Supplement 13*, ed. Catherine Holmes and Naomi Stand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Frontiers in Question: Eurasian Borderlands, 700-1700*, ed. D. J. Power and Naomi Standen (Macmillan).

(三) 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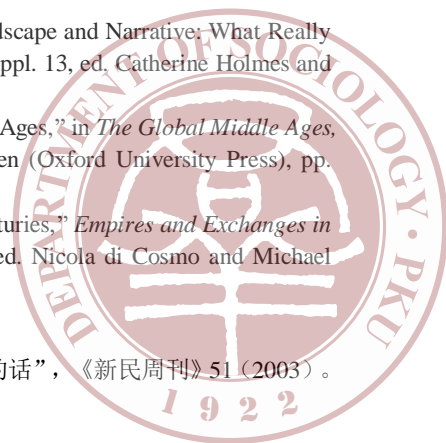
2018b Catherine Holmes and Naomi Standen, “Introduction: Towards a Global Middle Ages,” in *The Global Middle Ages, Past and Present* Vol. 238, suppl. 13, ed. Catherine Holmes and Naomi Stand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44.

2018c Conrad Leyser, Naomi Standen and Stephanie Wynne-Jones, “Settlement, Landscape and Narrative: What Really Happened in History,” in *The Global Middle Ages, Past and Present* Vol. 238, suppl. 13, ed. Catherine Holmes and Naomi Stand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32-260.

2018d Naomi Standen and Monica White, “Structural Mobilities in the Global Middle Ages,” in *The Global Middle Ages, Past and Present* Vol. 238, suppl. 13, ed. Catherine Holmes and Naomi Stand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58-189.

2018e “Followers and Followership in Northeastern Eurasia, ca. Seventh to Tenth Centuries,” *Empires and Exchanges in Eurasian Late Antiquity: Rome, China, Iran, and the Steppes ca 250-750CE*, ed. Nicola di Cosmo and Michael Maa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400-418.

¹ 有人认为此话出自胡适，实为谬传。相关研究参见谢泳，“胡适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新民周刊》51（2003）。



- 2017 “The Attraction of Opposites: Owen Lattimore and Studies of th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Roman Frontier Studies* 2009: Proceedings of the XXI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Roman Frontier Studies (Limes Congress), ed. Nick Hodgson, Paul Bidwell and Judith Schachtmann (Archaeopress), pp. 357-364.
- 2013a Naomi Standen and Gwen Bennett, “Difficult Histories: Changes in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Liao in PRC Regional Museums over Three Decades,” *Modern Asian Studies*, 48.6(2014): 1519-1565.
- 2013b “Foreign Conquerors of China,” *Demystifying China: new understandings of Chinese history*, ed. Naomi Standen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p. 33-40.
- 2011a “Integration and Separation: The Framing of the Liao Dynasty (907-1125) in Chinese Sources,” *Asia Major*, 3rd ser., 24.2(2011): 147-198.
- 2011b “Who Wants to be an Emperor? Zhao Dejun, Youzhou and the Liao,”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ed. Peter Lorg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p. 15-46.
- 2011c Gwen Bennett and Naomi Standen,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Views of the Liao (10th to 12th Centuries) Borderlands in Northeast China,” *Places in between: The Archaeology of Social, Cultural and Geographical Borders and Borderlands*, ed. David Mullin (Oxbow), pp. 80-98.
- 2007 Naomi Standen and Francis Jones, “Revealing Alternatives: Online Comparative Translations of Interlinked Chinese Historical Texts,” *Creating and Digitizing Language Corpora: Vol. 2, Diachronic Databases*, ed. J.C. Beal, K.P. Corrigan and H. Moisl (Palgrave), pp. 172-195.
- 2005 “What Nomads Want: Raids, Invasions, and the Liao Conquest of 947,” *Mongols, Turks and Others: Eurasian 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 ed. Michal Biran and Reuven Amitai (Brill), pp. 129-174. (Japanese trans. Yamane Naoki 山根直生, 2018).
- 2003 “Raiding and Frontier Society in the Five Dynasties,” *Political Frontiers, Ethnic Boundaries, and Human Geographies in Chinese History*, ed. Nicola di Cosmo and Don Wyatt (Curzon Routledge), pp. 160-191.
- 1999a “(Re)constructing the Frontiers of Tenth-century North China,” *Frontiers in Question: Eurasian Borderlands, 700-1700*, ed. D. J. Power and Naomi Standen (Macmillan), pp.55-79. 1999b “Introduction B. Nine Case Studies of Premodern Frontiers,” *Frontiers in Question: Eurasian Borderlands, 700-1700*, ed. D.J. Power and Naomi Standen (Macmillan), pp. 13-31.
- 1997 “Alien Regimes and Mental States: Review Articl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40.1 (1997): 73-89.
- 1996 “From Region of Frontiers to Frontier Region: The Political Uses of Ethnic Identity in Tenth-century North China,” *Selected Papers of the 10th Biannual Conference,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ed. Lucie Borotová (Prague: Charles University), p. 18.
- 1992 “Confucian ‘Renegades’ and Images of Loyalty for Tenth-century North China,” *Bulletin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Studies* (1992), pp. 14-22.
- 1991 “Living Abroad: Han Chinese Servants of the Liao Dynasty (907-1125) in the Te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 *Medieval History*, 1.3 (1991): 128-133.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304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